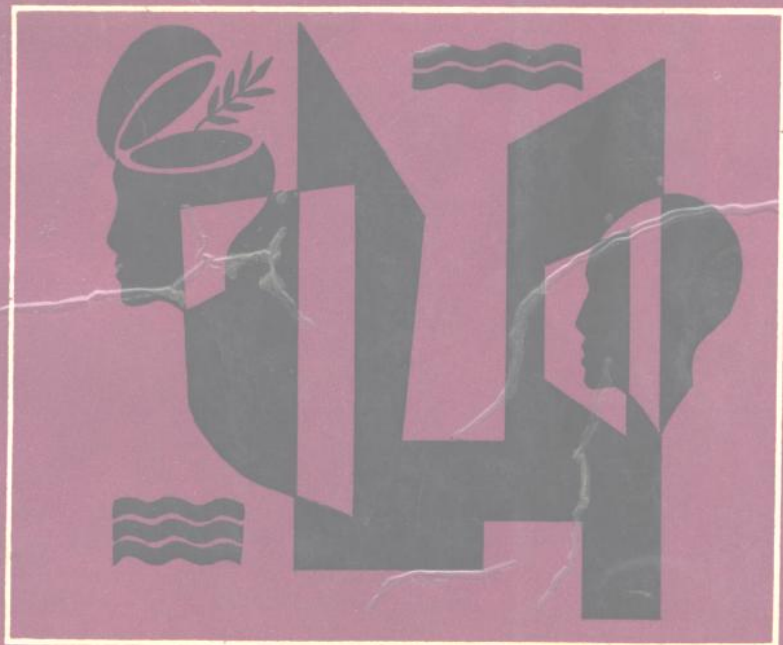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权力的媒介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煜 裘志康 译



华夏出版社

权力的媒介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煜 裘志康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卫平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波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by

J. Herbert Altschull

Longman Inc. 1560 Broadway, New York, USA, 1984

权力的媒介

——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煜 裘志康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路)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81千字 插图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册

ISBN 7-80053-226-7/Z·026

定价：6.35元

西方新闻理论的新作

——写在《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前面

林 珊

美国丁·赫伯特·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权力的媒介》是1984年出版的较新的新闻传播学理论著作，现已由黄煜、裘志康二位同志译成中文，这是十分可喜的事。近年来，向我国新闻学界翻译介绍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著作屈指可数，我认为这本《权力的媒介》是称得上较有参考价值的一本著作。

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西方新闻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部较好的著作。本世纪60年代以来，批判学派作为一股学术思潮正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迅速崛起，影响日益增大。他们著书立说，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制度上进行理论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注重资本主义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情”，并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医治处方”；他们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各种正统的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坦率承认现存的弊病，并且加以揭露和批判，比起那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来说，他们独树一帜，重“破”轻“立”，尖锐有力，因而更加发人深省。它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深化、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消除弊病，重找出路，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反映在理论学术上的一个新的重要动向，它的出现和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新闻传播领域，美国传统经验学派战后逐渐主宰了西方学术论坛，“社会责任论”则成为指导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活动

的基本理论。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西欧一些国家的传播研究异军突起，运用制度结构的宏观分析方法，对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展开了比较猛烈的批判。近年来，这股学术思潮迅猛发展，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也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媒介》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迄今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等等。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无疑对我国新闻传播界人士了解西方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很有裨益。

作者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跨入新闻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实习记者，以后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美联社驻费城、华盛顿的编辑、驻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首席记者，接着在纽约担任《纽约时报》、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后来主持全国广播公司西雅图广播电视台的工作并一度担任《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在这以后，攻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使他对很多值得思考探讨的新闻理论问题能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提出一些看法。作者说，如果计算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时间的话，前后断断续续可说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由于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又攻读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所以，本书具有史论结合的特色；并且着重探讨了新闻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因而本书取名为《权力的媒介》。

本书分为四篇共十一章，在每一篇里作者都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第一篇共四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指美国）新闻媒介的生产、发展，最后怎样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探讨了新闻自由、新闻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新闻记者的作用

等理论问题。作者从“便士报”兴起后广告的发展，到了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所控制，从而得出结论：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篇共三章，作者在这三章中综合分析了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将世界的新闻媒介划分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每一章论述一种新闻模式及其特征和主要理论。作者认为美国传播学家韦·尔伯·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对苏联新闻事业的分析是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因此，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并不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第三篇的三章，在全书中占重要地位，因为它在论述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新闻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诸如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新闻媒介的内容与财源的关系，以及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等问题。作者在论述中还展望了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前景。

第四篇即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作者将上述他提出的三种新闻模式形象地比作一部交响乐中的三个乐章，分别就这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根本问题存在的异同展开了比较研究，进而分别论述了它们的优缺点，最后得出了新闻学发展迄今为止的七项结论：

（1）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不过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

（2）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3）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

（4）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说，宣称他们为了人

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5) 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

(6) 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

(7) 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

通观全书，在有些重要的新闻理论问题上，作者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观点，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说，是哪些问题呢？

第一，关于客观性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是长期以来西方新闻界当作“信条”来标榜的。作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剖析了所谓“客观性”的原则是怎样产生的，它适应了什么需要，是否能行之有效等等。

作者在追溯客观性的起源中谈到曾任美联社总经理达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极力鼓吹过客观性原则，他将客观性解释为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和公正，并说客观性新闻“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库珀的继任人韦斯·加拉格尔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实现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分清思想与情绪，事实与感觉。”也就是美国新闻学界曾流行过的说法：“新闻(News)和意见(Views)分开。”

为什么要标榜客观性的原则？本书作者认为对客观性的推崇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为争取订户一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它们的竞争对手还有象路透社之类的外国大通讯社，在美国国内也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的辛迪加新闻社。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标榜客观性才有利可图。所以，作者认为：“政治上的中立就能取得商业上的赢利。”他指出，新闻媒介在坚持客观性的过程中，有时也发表一些有损于政界和工商界名流的东西，但是，这绝不能超越统治阶级所规定的范围，不能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作者分

析了麦卡锡时期美国新闻媒介所进行的宣传，得到的结论是，所谓客观性原则既可用作伸张正气，也可用来产生邪恶。在这两种情况下，新闻媒介实际上都是“强权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无真正的客观、独立可言。作者还尖锐地指出，70年代美国发生的“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介纷纷对尼克松及他的行政当局进行抨击，事实上，新闻媒介抨击的只是总统，而不是总统制。换句话说，没有触及权力的根基。

美国自19世纪以来所标榜的客观报道，是有政治用心的。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理论已逐渐在“解释性报道”的倡导声中受到批评。美国新闻学者曾指出：“客观”就是不加评价的写作，但是，这种排斥偏见和评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见美国《新闻学季刊》1980年夏季号）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又联系社会经济和政治对立加以剖析，他们的这些分析和见解，对于我们怎么更好地认识资产阶级长期所标榜的客观性，无疑是有益处的。

第二，关于新闻媒介的内容由谁决定的问题。

新闻媒介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等报道什么新闻？怎样报道？以及它们发表什么言论？这些问题究竟由谁作出决定的等等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书作者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新闻媒介的内容与财源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了新闻媒介与资金提供者的关系，认为这关系分别以下列四种形式表现出来：

1.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有些新闻媒介属于国营。

2.商业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新闻媒介的所有者或出版人往往就是广告商本身。

3.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

4.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要属于“官方形式”，新闻媒介为官方所有，它们宣传的内容是官方的目标和政策。市场经济（资

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属“商业形式”,其内容为商业利益服务。发展中国家则属“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又一次得出结论:所有新闻媒介都不可能真正地进行客观报道,都是受“利益集团”操纵来为其目的服务的。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媒介向这种价值体系提出挑战是罕见的。

新闻媒介的内容由什么决定?马列主义新闻学的回答历来是鲜明的,那就是毫不掩饰地认为,自阶级社会以来,新闻媒介无不具有阶级性,新闻媒介的内容自然也都取决于阶级的需要。传统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却总是以抽象的“公正需要”、“社会需要”来掩盖其阶级的需要。本书作者看到了新闻媒介的内容与新闻媒介的经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进而根据这种关系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尽管在分析上和观点上还有偏颇,但不能不承认这种探索途径较之传统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前进了许多。

第三,关于“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问题。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新闻学者最先倡导,然后流行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闻理论。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美国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作出的调查报告指出,新闻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然而一部分新闻媒介提供的服务脱离了社会需要,另一部分新闻媒介的内容甚至受到社会的谴责,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引起政府的控制。基于这种情况,该委员会提出,新闻媒介应承担社会责任。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学者施拉姆、彼得森、西伯特等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出版,成为阐述“社会责任理论”的代表作,一直受到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学界的推崇。从此,一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把“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奉为新闻媒介的“理想模式”。然而,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对于这种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首先,他认为“社会责任”一词语义含混,各种社会的人几乎都可以对它作出自己的解释。为此,作者还专门从

语义学角度探讨了“责任”一词在现代英语中的各种歧义，进而指出它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附带说一下，对新闻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作者常常另辟蹊径，首先从语义学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从而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其次，哈钦斯委员会曾要求新闻媒介尽到提供“非赢利性公众服务”的职责，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传播媒介提出“非赢利性”的要求，实在是荒谬可笑的，他说：

“因为就连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版者，也不可能亏本出版报纸或刊物。”他举例说明在60年代反种族浪潮中，美国新闻媒介所作的宣传充分说明“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作者从这里作出断言：在处理种族问题的过程中，美国的“新闻媒介或以奴隶的形式，或以白人社会及其制度所产生的偏见，迎合了长期以来实行种族主义活动的社会利益。”所以，阿特休尔教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责任理论”是一个“含义不清的理想模式”，它在实践中是无法兑现的，新闻媒介最终只是为统治者所利用的一种工具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向“社会责任理论”提出挑战的西方新闻学者，为数尚不多。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对这种理论所作的分析和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不过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理论和其它一些理论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否定“自由放任”，鼓吹“国家干预”等理论一样，都是适应国家垄断主义的需要并为之服务的。

除上述问题以外，作者还在本书中论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远比责任重要，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倡的“新闻自由不受外界控制、不受权力操纵”的看法进行了批评，他深刻地揭露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新闻界实际上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人们认为“新闻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无数新闻从业人员将此视作自己崇高的职业理想并毕生为之真诚地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从整体上说又是社会统治力量的一个代言机构，受到商业利润的支配。作者认为，在这个两难困

境中，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可言。作者的看法认为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离不开国家的新闻政策，区别只是在于名称和形式的不同，有些国家直接制定新闻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则通常以“协会”、“委员会”、“计划”等形式间接地规定政策。最后，作者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认为新闻自由必须铲除私利，如果为私人谋利的话，则一定丧失自由。

总起来看，全书资料丰富，观点也比较新颖。许多地方联系了自然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思想比较开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着眼于新闻媒介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闻媒介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剖析显然是有价值的。在批判一些传统的观点时，虽有失之偏颇或分析不足的问题，但有些见解仍是有启发性的。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和新闻理论进行了分析归类，提出了一家之见。但是，新闻媒介和新闻理论都具有阶级性，如果牵强地进行比较，显然会出现谬误。作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时，并没有进行恶意的攻击或谩骂，有些问题的研究对我们不无启迪，例如作者较为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出版自由思想，认为马克思提出实现出版自由不仅要消除外部的限制（即有形的书报检查制等）更要消除内部的限制（即深受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影响，追逐金钱，唯利是图，从而丧失了写作、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具有深刻意义。但是，对有些问题如列宁论报刊的三大作用等的解释则不尽正确。

此外，作者在写作上摒弃了理论著作惯用的演绎归纳、抽象论证等方法，而是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代的主要问题，分析和总结了新闻媒介的发展变化，批判了各种流行的传统见解。当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加上翻译不可能完全再现原作风貌，人们在阅读此书时不一定会习惯作者的论述方法，也可能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对此，我们可以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总之，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繁荣学术、研究借鉴、批判创新，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理论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1987年6月于北京

原 著 序

这部书的写作计划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整天写作此书，而是不断在积累经验进行回忆。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这些经验和回忆，还有文献研究、直接观察以及我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采访。

当我还在中学念书时就进入了新闻事业这块领地，成为实习记者时年仅18岁。我在离开生气勃勃的新闻工作岗位转而当一名教师和研究人員之前（起初经过一番反省），曾在众多的地方寻求“新闻”，包括华盛顿和西欧；并在许多“新闻媒介”中从事新闻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和杂志。虽然我在此后深入研究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分析能力，但有关新闻媒介的真实情况，却还是我在从事一名“职业”记者那些年里获得最多。其中有一段亲身经历可能最受启发。

那是1957年，我是美联社派驻西德首都波恩的首席记者。那时候，康拉德·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经过一次大选，刚好再度执政。由单独一个政党赢得联邦议院下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现在也仍然是）。9月15日夜间，我把选举的结果向各家晨报作了充分的报道。第二天上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几位领导人正在下院餐厅饮用咖啡，我便坐在一旁，因为我还得为次日的下午版报纸搞一篇连续报道，想捕捉他们的谈话加以引用。

我忽然发现这些议员的神情令人惊诧，他们严肃不语，若有所思，并没有象我所预料的那般对选举结果大喜过望。他们当然对其政党选举获胜感到高兴，但是却对这次胜利超出的程度表示担忧。他们对阿登纳的领导并不害怕，但它关系到大是大非问题。因为，没有多少年前，德国人民曾一度心甘情愿地追随着蛊惑人心的阿道夫·希特勒，听凭他摆布到任何地方。如今对于这些闷

闷不乐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来说，德国人民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或许还会照样不加思索地去紧跟一位领袖。

领悟到事态的这一变化使我高兴。于是，我便回到办公室为下午版的报纸写了一篇报道，导语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选举胜利，胜利如此彻底使他们感到担忧。据我所知，其他人决不会那样写。

半小时过后，连接纽约美联社总部与波恩分社的直线电传发来一份电文，实际上向我质问：“谁为这篇报道提供了消息？”电文言外之意说明纽约编辑部那伙人对我不信任，好象我杜撰了这条消息。无论如何，这表明人们对于新闻的准确性很留心。纽约美联社的领导成员是由一些曾在德国工作过的人所组成，其中第一号人物就是后文将要论及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

于是，我顺从地作了答复，提供了消息来源者的姓名，其中一人便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当时他任经济部长，后来接替阿登纳当了总理，此人是该国最可靠的消息提供者。然而，纽约又发来一份电文要求我修改导语，去掉有关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担忧的第三段内容，把“新闻”放在报道的开端。尽管强人所难，我还是遵命作了修改。

但是，来去不断的电文通讯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又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文，指示说美国公众对这次选举最感兴趣的是它怎样迎合了美苏“冷战”斗争的需要，电文要我在报道中强调阿登纳的胜利等于共产党人的“失败”，因为共产党曾竭力掀起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其对立派社会民主党的运动。

不，我在给编辑部回电时告诉他们，这种判断纯属错误。实际上苏联希望阿登纳获胜，因为俄国人同真正的保守派打交道更显得轻松自如，俄国人可以攻击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而假如换了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那段时期，则会使苏联感到窘迫难堪，因为不管是苏联共产党还是西德社会民主党，究其家谱世系，都溯源于马克思，要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绝非易事（总是

难以周全)。我对纽约总社说，反对阿登纳的运动并不意味着要在选举中击败他，而是替他从反共产主义的德国人那里拉选票。

这场对话终于结束了。电传机那一边的人是掌权者，他们要我服从命令并写出宣扬阿登纳获胜挫败了共产党人企图的报道。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或者遵命，或者辞职。我的妻子和孩子极不赞成任何富于浪漫色彩的英雄行为，于是我只好违心地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采写。剩下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恳求他们不要把这篇发出的报道署上名字。我有点虚张声势地申明：“去掉我的名字。”

这个事例说明了新闻在国际场合下的性质。它必然要按照“我们”对“他们”或“好人”对“坏人”的格式进行报道。“新闻”的实质是相互冲突，一个记者极难用灰色的笔调写出报道，甚至指出“我们”与“他们”一致的地方以及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也难乎其难。认为新闻具有某种独立的特征或曰报道只反映事实本身的观点实属大错，正如同认为记者、编辑总能够超脱出来塑造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想法一样，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与“他们”的冲突犹如渗透在他们同胞中的情形那样，已被彻底地网罗到新闻记者的信仰体系中，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设想新闻记者们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用他人做不到的方法“客观”地反映周围世界的看法无异于相信逻辑上的谬误。

有些记者——在人们的预料中远不止一个——想方设法运用逻辑和分析的技巧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试图超越支配其他文化的冲突规范。在我写作此书的背后就隐含着尊重这些记者的想法。尽管我在书中对新闻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场，但我的意图并非谴责新闻事业或新闻机构本身。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大学教师和批评家，我毕生热衷于新闻事业，所以，读者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书中出现的批评观点。

冲突的情景一旦在国际场合成为最易被人识别的东西，那它

在新闻“报道”中就无处不在。难怪那些受指令的报道都是以一种冲突性的笔调进行叙述的。于是乎，它成了在所有场合下处理新闻的方法。因此，新闻一词变得令人费解，新闻媒介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本书中，新闻媒介与报刊^①这两个词是通用的。在探讨电视及广播的新闻特性时，我几乎专门论述其新闻的职能而不是娱乐节目的创作。因此，书中提到的广播电视的新闻和报纸上的新闻指的是一个意思。

赫伯特·阿特休尔

① 报刊一词英语系“press”可以泛指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也可以作新闻界、报业、出版界、通讯社等多种解释。为方便或修辞需要，作者将其与大众媒介、传播工具、新闻媒介等混合使用。对此，译者根据书中上下文意思译成相应的汉语。——译注

目 录

西方新闻理论的新作

——写在《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前面

原著序

第一篇	1
第一章 报刊的起源：早期媒介关系	3
最初的新闻工作者	3
自主原则	9
第二章 神话的诞生：第一修正案，革命的机构	19
民主的假设	19
主要的症结	24
多余的45字	29
公正与爱的法律	34
第三章 商业报刊，1833—1917：赢利的机构	41
山巅上的圣城	41
便士报	52
第四章 揭丑与赚钱	67
广告的兴起	67
“庞大的广告机器”	71
新闻管理者	78
孤独的记者	81
揭丑者年代	89
第二篇	97
第五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	98